

郭春生 著

勃列日涅夫
18
年



 人民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06JA710022）资助

勃列日涅夫 18 年

郭春生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勃列日涅夫 18 年/郭春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01-007623-2

I. 勃… II. 郭… III. 政治-概况-苏联-1964~1982
IV. D7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886 号

勃列日涅夫 18 年
BOLIERINIEFU 18NIAN

郭春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07623-2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www.peoplepress.net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

(代序)

陈之骅

一、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长达 18 年之久 (1964—1982 年), 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 1/4, 比列宁 (1917—1924 年)、赫鲁晓夫 (1953—1964 年) 和戈尔巴乔夫 (1985—1991 年) 执政时期都长得多, 而仅次于斯大林时期 (1924—1953 年)。当然,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 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 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 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比历史上其他各个时期都高。另一方面, 在这个时期,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特别是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桎梏, 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可是, 以勃列日涅夫为

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这就使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在各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危机。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 18 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剖析这一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于揭示后来苏联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我们目前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在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发表的关于苏联历史和苏联剧变问题的著述中，一般都着重研究斯大林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有不少是研究赫鲁晓夫时期的。学者们对这些时期的兴趣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它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巩固时期，这个时期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错误，对于以后苏联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赫鲁晓夫时期当然远不如斯大林时期那么辉煌，但这个时期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调整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动荡却震动了苏联国内外，并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而戈尔巴乔夫时期是苏联由衰而亡的时期，是剧变发生的时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著述却如凤毛麟角，迄今为止，在我国学术界不仅还没有一本专著问世，而且论文和资料性的东西也不多见。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之所以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举出三点。第一是对这个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足。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走向衰落的关键时期，不对这个时期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便无法全面总结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无法科学地揭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但是，正如上面所谈的，目前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主要热点并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一部分学者看来，要揭示苏联剧变的原因，主要应研究斯大林时期；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主要应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则简单化地认为，勃列日涅夫取消了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改革路线，恢复了所谓斯大林体制，因此只要把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弄清楚，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所有以上看法都反映了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和重要性估计不足。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薄弱的另一个原因是研究的难度较大。这种难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时期虽然长达18年，但是从国内发展的进程来看，缺乏激动人心和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从总体上可以说是风平浪静。要透过这种平静和稳定的表象去揭示被掩盖着的矛盾和问题，并剖析其性质，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很多政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领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如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等，这些事件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国内外普遍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发表了不少，近年来还公布了一批有关的历史档案。不论这些著述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如何，给学者们的一个印象是这些问题已经谈得够多了，难以再深入一步或是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薄弱的再一个原因是资料相对地比较少。无论是包括历史档案在内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是外国学者，首先是俄国学者的新著都不多。据一些俄国史学家

解释，近年来俄国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著述不多的原因，除了不少历史档案还没有解密以外，还由于某些历史问题在当前还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敏感性。新材料的不足对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问题增加了困难。

为了加强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研究，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今天来说，首要的是要站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高度，或者说是站在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观的高度去思考和审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它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两次提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显然首先和主要是指苏联。由此可见，邓小平理论虽然并未直接涉及苏联历史上的问题，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但它对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古往今来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站在他们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历史的。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学者来说便是这一高度的体现。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既符合历史的实际，又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还要求我们要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客观地分析和评价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各种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概念化和片面化的研究方法，更不能先有一个框框，然后把各方面的问题都用这个框框去套。在上世纪 60—70 年代，我们曾经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认为在那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样的提法在我们的著作中已经逐渐不见了，但它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失。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了剧变的情况下，在回顾苏联整个历史进程的时期，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整个国家制度的性质已经由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当然，这一时期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行径，确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旨相悖；但是以“社会帝国主义”这种提法来概括这一时期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恐怕也还是可以商榷的。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另一个概括是说这是一个“停滞”时期。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来的。“停滞”的提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日趋僵化，教条主义日趋发展，各级领导部门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官僚主义之风盛行，权力高度集中和党内外缺乏民主空气等等现象确实使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停滞。但是如果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整个时期，包括前期和后期，说成是“停滞”时期，把这一时期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都说成是处于“停滞”状态，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进程和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切忌从概念出发，要打破各种老的、新的框框，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的、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

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问题

勃列日涅夫是在一次被称为“宫廷政变”的行动以后开始执政的。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通过事先密谋和突然袭击的方式，迫使赫鲁晓夫“自动”退休。这种做法当然是很不民主，也是很光彩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之所以能比较容易地取得夺权的胜利也并非偶然。

赫鲁晓夫在其执政的11年间，尽管在内外政策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实践中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改革并未取得积极的成果。特别是在他的执政后期，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工业管理体制反复无常的变化，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模式，反而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农产品收购和自留地政策上的忽左忽右，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意地合并集体农庄和把集体农庄改变为国营农场，完全脱离了当时农村的实际，反映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这些失误造成了1963年严重的农业危机。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例行换届选举时，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委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和周围委员至少要更新1/3，市委、区委及各级基层组织委员至少要更新1/2。做出这一硬性规定的出发点可能是积极的，但在实践中出现了每次在基层选举时有大批书记因此落选，更换率高达60%。对基层组织的稳定产生了影响。1962—1963年

间采取所谓的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削弱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而且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混乱，引起了各级干部很大的不满。有些学者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使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直接原因。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揭发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所谓“解冻”运动，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却引起了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和某些错误思潮的抬头。“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①在对外政策上既要与美国争夺，又不敢碰硬，甚至出现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使国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尊严。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开始执政的。指出这些情况，对于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进程，包括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很重要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问题很多，这里只是就对后来苏联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问题作一些简要的分析。

1. 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国家实力由盛及衰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总的来说是有发展的，特别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顺利完成，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上任后烧起的“三把火”，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振奋。这五年内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4%，从而使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速度连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制止。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仍达到6.4%。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2294亿卢布，上升到1970年的3473亿卢布和1975年的5112亿卢布。农业

^① 吴冷西著：《忆毛泽东》，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生产总值则由 1965 年的 883 亿卢布，上升到 1970 年的 1084 亿卢布和 1975 年的 1128 亿卢布。粮食产量明显提高，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七五”计划（1961—1965 年）期间的年均产量 1.303 亿吨增加到“八五”期间的 1.676 亿吨和“九五”期间的 1.861 亿吨。单位面积产量 1965 年为每公顷 9.5 公担，1970 年增加到 15.6 公担，1978 年又增加到 18.5 公担，与 1965 年比较几乎翻了一番。生产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都认为，70 年代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生产的发展，使苏联的经济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1975 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工业总产值的 80% 以上，而农业总产值则达到了 85%，^①从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这一时期苏联国力的增强与西伯利亚地区大量油气田的开发成功也有一定的关系。恰好这时期，国际上石油价格暴涨，因而使苏联得以通过出口石油换来大量外汇。据估计，在 1974—1984 年期间，苏联在这方面的收入共达 2700—3000 亿美元。有些学者往往从消极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大量的石油外汇收入掩盖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矛盾，因而它所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的。这种分析多少是失之偏颇的。体制的矛盾和弊端是早就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它们，不在于“石油美元”的掩盖不掩盖。因为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油价上涨则是一种有利机遇，并非巧取豪夺。再说，勃列日

^① 以上统计数字均引自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0、123、234—235、251—252、258、82 页。

涅夫执政时期的经济增长也不是单靠出口石油取得的。70年代中期，也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极盛时期。这是片面发展军事工业的结果，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只是想指出，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成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大国和使美国感到畏惧的头号敌人与称霸世界的主要对手。

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经济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从1965年开始的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在列宁领导的“新经济政策”改革之后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当然，它没有也不可能触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这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平常和很不彻底的改革，但在当时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当时在柯西金领导下工作、在苏联解体前夕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这次改革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柯西金1965年的经济改革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仅在随后的5年，工业生产就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2%（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提高23%），消费品（即‘乙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终于同过去一直被特别重视的‘甲类’产品生产的增长幅度相等。”^①

^① [俄罗斯] 尼·伊·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历史》，《政党与当代世界》1993年第4—5期合刊。

雷日科夫在这里提到的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甲乙两类工业发展的速度已经十分接近。据统计资料表明：从1966—1970年，工业生产总产值年均增长8.5%，其中甲类产品增长8.6%，乙类增长8.4%。^①这种情况在苏联工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进行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措施。1965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根据勃列日涅夫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接着调整农业政策的一些决定和法令陆续出台，其中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收购计划五年一定、减低农业税率、放宽宅旁园地限制以及国家每年拨专款补贴农庄庄员养老金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农业管理，加强了对农庄庄员的物质刺激。从1965年至1975年间，曾先后三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应该承认，所有这些措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发展的速度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在“八五”计划以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无论是社会生产总值，或是国民收入总值和工业生产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均直线下降。其次是经济增长大都是在传统工业部门，新兴工业部门（如微电子工业等）开发较少。第三是生产效益不断下降。这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生产效益不高主要表现在高

^①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投入、低产出以及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经营。第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苏联历史上一般都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方针。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居民收入提高较快，出现了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和积累率降低的情况。出现上述各种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强化。“新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根本触动这种传统体制，但是即使这样的改革也半途而废了。勃列日涅夫及其集团深恐改革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动摇他的权力基础，因而逐步取消了各种改革措施，还组织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这样就使得传统体制更加强化，使它固有的弊端进一步加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世界上正在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之所以未能及时引进，有些新技术即使引进了也未能很快应用到生产上去，这也是与传统体制所起的阻碍作用分不开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企业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不高，因为这样做不仅要承担风险，而且即使成功了也只能成为领导部门提高计划指标的依据，而企业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科技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约化方针的实现，使经济未能实现增长方式的改变。这仅是传统体制弊端加重的一个方面的例子而已。

除了体制这一根本性的因素以外，还有两个消极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特别突出的。一是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尽管已经意识到了要加强消费品生产的问题，但实际情况是重工业的生产总值在整个工业生产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保持在73%—75%之间。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斯大林时期。统计资料表明，18年中只有1968

年、1969年和1970年3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略低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①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很好地为农业服务。1975年的材料表明，为农业提供的机器设备仅占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总产值的2.5%。^②二是军备竞赛对国民经济的重大压力。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的来说，苏联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国民经济负担最为不堪重负的时期。可以说，苏联作为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由于以上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经济出现了日益衰退的现象，国家的实力逐渐由盛而衰。到了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

2. 政治体制日趋僵化，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以后，对被赫鲁晓夫搞乱了的传统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第一个措施是苏共中央1964年11月全会决定废除按生产原则划分党组织（即所谓“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立即恢复各个州和边疆区的统一的党组织。接着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也采取了同样措施。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又决定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全联盟部”。根据这一决定，各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撤销，重新建立了中央部门领导系统。同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

^① 陆南泉、张础、陈义初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125页。

^②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定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大取消了1961年二十二大通过的关于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上述措施的推行，使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干部队伍得到了巩固和稳定，在一定时期内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

在进行领导体制调整的同时，在政治思想领域和一些具体政策上也进行了某些调整，其中包括纠正赫鲁晓夫时期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尽管如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取消苏共二十大关于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提法，没有恢复把斯大林与马、恩、列并列，也没有正式为斯大林恢复名誉。1967年提出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尽管仍然是一种超越发展阶段的理论，但与赫鲁晓夫1961年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急进、浮夸口号相比，毕竟也不失为是一个小小的调整。在民族问题上，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为卫国战争期间被斯大林强行迁徙的少数民族平反，包括1967年9月为克里米亚鞑靼人平反以及为一些被斯大林镇压的乌克兰、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在宗教方面，采取了比赫鲁晓夫时期宽松的政策，包括在1965年改组宗教事务部门，强调维护教会的合法权利和依法管理宗教，1970年批准俄罗斯东正教召开新的全俄宗教会议，特别是在1977年的苏联新宪法中把原来宪法中关于人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改为有“进行无神论宣传的自由”等，上述调整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再加上第八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带来的经济上的发展，使得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全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形势。

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集团没有利用这种形势，抓

住机遇进一步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相反地变得自满起来，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从而使固有的因循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使传统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由稳定逐渐转变为僵化。

政治体制僵化首先表现在权力的不断集中。恢复部门领导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地方主义的抬头和管理上的混乱状态，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造成了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这些部门主要通过布置各种计划指标和下达文件的方式进行领导。据统计，到80年代初，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指示和其他大小法规竟达到20万种之多，^①它们几乎为企业全部活动规定了详尽的细则，使地方和企业不敢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必然导致国家机构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增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个部和20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正副部长级领导干部达到800多人，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这个部共有正副部长19人，其中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一件普通公文의传阅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②

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尽管

^① 参见 [俄罗斯] A.H.博哈诺夫等著：《20世纪俄国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581页。

^② 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